

IMAGINING INDIA
The ideas of a renewed nation

与世界同步

——印度的困顿与崛起——

亚洲最具影响
印度印孚瑟斯

卡尼◎著

许效礼 王祥钢◎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IMAGINING INDIA
The ideas of a renewed nation

与世界同步

印度的困顿与崛起

许效礼 王祥钢◎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 / (印) 尼勒卡尼著；许效礼，王祥钢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

书名原文：Imagining India

ISBN 978-7-5086-2504-1

I. 与… II. ①尼… ②许… ③王… III. 经济发展—研究—印度 IV. F13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6012号

IMAGINING INDIA by Nandan Nilekani

Copyright © 2010 by Nandan Nileka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

YU SHIJI TONGBU

著 者：[印]南丹·尼勒卡尼

译 者：许效礼 王祥钢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0 字 数：468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9-0849

书 号：ISBN 978-7-5086-2504-1 / F · 2174

定 价：6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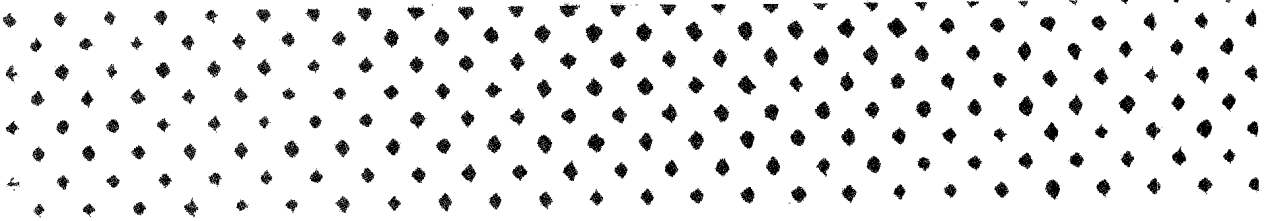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010-84849283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我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想一切都是从印度软件公司印孚瑟斯的会议室开始的。印孚瑟斯是印度信息产业的一颗明珠，南丹·尼勒卡尼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可以称得上是印度信息产业最有思想和最受人尊敬的领袖……尼勒卡尼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汤姆，当今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在我离开印孚瑟斯园区回到班加罗尔的路上，我反复回味那句话：“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

尼勒卡尼的意思是，世界正在变得平坦……变平？变平？天啊，难道他在告诉我，世界是平的？

——摘自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



谨以此书献给尼哈尔、詹哈维和罗西尼

序

每次我去印度，人们就会向我问起中国；而每次我去中国，人们都会向我问起印度。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谁会成为赢家呢？

我给予人们的回答总是一样的：印度和中国像两条超级高速公路，在每条路的前方，上空都高悬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中国这条高速公路铺设得十分完美，两边的人行道和路灯一应俱全，路中间整整齐齐地标出了白色的交通标志线。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路的远处凸起了一个限速墩，名字叫“政治改革”。当13亿人口以每小时120多公里的速度撞上限速墩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车飞到了半空，哐当一声摔了一下，司机和乘客们赶紧转过身来，彼此问道：“没事吧？没事吧？”如果所幸大家都没事，车子就会继续往前开。另一种情况是，车飞到了半空，哐当一声摔了下来，轮子全掉了。中国将会发生哪一种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期待着能有好的结果——因为这关系到世界的安定。

印度也是一条超级高速公路，只不过大部分路段坑坑洼洼，人行道也没有全铺好，还有许多路灯不亮，不同车道的分界线也不清楚。一切都有点杂乱无章，但是车辆却一直在通行。但是，别着急。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在远处，印度这条路缓缓变成了一条完美的6车道超级高速公路，有人行道、路灯，还有白色的标

志线。这么一条完美的印度超级高速公路是海市蜃楼呢，还是沙漠中的绿洲？印度会有将远景变为现实的一天吗？还是它老跟在远景的后面追，并且耍弄我们说，自己的潜力巨大？

我的老师和朋友南丹·尼勒卡尼决意确保印度超级公路不致成为海市蜃楼，他一定会这么做的。像我一样，他也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一位严肃的乐观主义者，然而这是指对自己祖国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他知道印度的前景是什么样子，就像伟大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达纳·梅多斯曾说过，我们地球的前景“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命运”。本书以高亢、动人、张扬、热情的笔调，论述了印度和它的朋友们该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以及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它们绝不放弃。

我觉得，南丹·尼勒卡尼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不二人选。全世界的公司总裁，不用提姓什么，仅凭人名就为人们熟知的并不多。硅谷有“史蒂夫”——姓乔布斯；西雅图有“比尔”——姓盖茨；奥马哈^①有“沃伦”——姓巴菲特；班加罗尔则有“南丹”——姓尼勒卡尼。

南丹是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简称印孚瑟斯）的创始人之一，而班加罗尔是印度的硅谷。印孚瑟斯、Wipro^②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则分别相当于印度的微软、IBM和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南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在我看来，就一句话，他是一位极善于把问题说清楚的人。是的，他，还有另外几位创始人，同传奇人物——印孚瑟斯的董事长N·R·纳拉亚纳·穆尔蒂一道，白手起家，建起了这家全球性的大公司。然而，南丹之所以受人追捧，是因为他具有独特的才能，不仅会为软件编程，而且还能阐明这一程序是如何顺应计算机行业正在兴起的发展趋势的，以及这些趋势将如何改变计算机行业，而这种改变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科学，最终还会反过来改变印度。正是他关于全球的竞争场地将被新技术“平整”的远见卓识使我获得了灵感，写出了《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南丹阐明问题的技巧在本书中，即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得到了最好的彰显。

① 奥马哈，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为巴菲特的故乡，也是他创办的投资公司的所在地。——译者注

② Wipro，印度第三大软件外包公司，主营全球信息技术服务。——译者注

尽管这本书对印度走过的，以及需要走的路进行了极有价值的说明，但是其意义绝不止于此。本书对南丹的印度同胞和他们的美国友人是一种激励。印度的政治和统治，相较于印度人民拥有，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才华而言，却远不被看好。对此，他们感到再也无法容忍。这会鼓励他们为印度设想并打造一种不同的前景。南丹了解印度企业家在没有政府帮助，或者面对政府阻挠和政治失灵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成就。他了解印度的青春躁动会迸发出什么样的能量。每翻过一页，我似乎都听到他在说：“如果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是那么生机勃勃，志向高远，那么印度就势不可当了。它会变得势不可当的。它会变成那条平坦的6车道超级高速公路。”他的观点不无道理，即尽管印度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但是其潜力还没有得到发掘。

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南丹观点的总结：“独立之初，印度领导人的意识显然要比人民超前。印度宪法旨在缔造一个人民普遍享有选举权的世俗民主国家。政府，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对自己虽不理解，但却充满信赖的国家，遂信心陡增。但是，60年以后，政府和人民的角色似乎颠倒了过来。人民信心大增，充满遐想，可是印度的领导人却似乎畏首畏尾起来——印度的政治已经变得讲求权宜之计，缺乏远见卓识。如同蒙特克指出的，在印度的政治家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异口同声地赞成改革要温和一些’。”

南丹反复对印度进行了颇有裨益的提醒，说印度自1990年以来的经济革命是“人民推动的变革”。实际上，这是过去60年间在该国以独特方式发生的一场最大的和平革命。因为革命是以和平的方式发生的，且推进缓慢——并非人民推翻了一位君主或者推倒了一堵墙，所以它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但是它又确实使一个社会摆脱了某种沉重的负担，摆脱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羁绊，而造成羁绊的原因是缺乏雄心以及采取上层强加的、破产的经济理念。取而代之的则是这场革命激发的能量和远大抱负。像南丹这样的软件业企业家不仅是这场革命的参与者，还是革命的发动者。他们展示了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到的。然而，追随他们的还有农民们，他们要求自己孩子的学校强化英语教学；也有做母亲的，她们节衣缩食，供孩子去听辅导课，将来考地方技术学院；还有电话客户服务中心的青年们，他们夜间值班守电话，白天则到商务学校听课——谁知道这些人什么时

间睡觉呢！正是这场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时代的青春躁动引发的革命，已经使人们不满足于生活给自己指定的角色和地位了。这就是印度人民发动的这场革命威力如此强大的原因所在，这就是南丹对我们说的使这场革命“不可逆转”的原因所在。

自然，本书也没有忽略印度巨大的收入差异和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它直言不讳地指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具备接受有益的观念，且不为无益的观念所羁的勇气和乐观主义”。这就是执行的问题。南丹坚持主张，仅仅观念正确还不够，这些观念还必须被采纳。仅仅被采纳还不够，它们还必须被落实。观念仅仅以正确的方式被加以落实还不够，它们还必须随着时间的流逝，时时被加以考查调整，我们要看一下哪些是行得通的，哪些是行不通的。

南丹·尼勒卡尼的生平和著作都证明了新印度确实已经登场的事实——从很多方面，在很多地方看来，情况都是如此。是的，他宣布，新印度已经在商界现身，在大学校园里现身，在许多村庄里现身，在许多学校里现身了。然而，它会发展到具有关键意义的规模吗——会向四面八方铺展，以至于有一天真的成就那条平坦、顺畅的超级高速公路吗？抑或这个印度永远只是立在远处，可望而不可即呢？

南丹虽乐观却不天真。他会说，这得视情况而定：这完全取决于印度能否有一个同人民一样雄心勃勃的政府，取决于它的政治家能否同年轻人一样乐观，官员能否同企业家一样具有创新精神，邦、地区和国家三级领导人能否像这个国家里的年轻人那样跃跃欲试、善于创造、生机勃勃——在我看来，他们就该像南丹·尼勒卡尼这样。

托马斯·弗里德曼
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偶然成为企业家的感悟

“你们在印孚瑟斯园内的道路这么好，可为什么园外的路却这么糟呢？”来访者这样质疑。我刚刚对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就是印度作为世界上又一台经济增长的巨型引擎正在崛起的原因，以及这个国家如何在迅速地赶上发达国家。但是我的客人——他刚从纽约乘飞机前来——对此却直言不讳地表示怀疑，因为他在豪瑟公路上塞车接近两个小时才赶到我的办公室，路况混乱不堪，让人难以容忍。

尽管他这个问题我已经从别人嘴里听到过多次，但是每次回答前，我都得思忖片刻。对这种问题，不长篇大论地解释一番，怎么能回答得好呢？通常，我只能简单地答道：“是政治的缘故。”答复含糊其辞。“哎，”他却很执著地问，“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去搞政治呢？”我对他说，这不是在美国。在美国，像迈克尔·布隆伯格那样的人可以做到今天还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明天可能又被选为纽约市长了。企业家的身份不仅让我和印度政治无缘，还使我极易成为民粹主义言论的攻击对象。我说，自己参与政治是不可能当选的。

他提出的问题也让我思忖良久。我们园内的路修得这么好，而外面的路又这么差，这当然不是缺乏技术、资源或专长造成的。这类矛盾似乎成了印度的固有特征，事情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对我们这里很多方面反差巨大的议论都让人听

烦了——亚洲第二大贫民窟就坐落在这里，这个发展速度很快的民主国家。一个正在崛起的知识大国同时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辍学儿童。我们的各大企业正在创建国际品牌，然而官僚作风却依然令我们的新兴企业家窒息，让小企业主感到悲观失望。

企业家的多年经历尤其使我认识到，尽管印度经济近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它却依然苦于应对这些使其退缩不前的挑战。今天，我们是一个远未挖掘出自身潜力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发轫将近20年之后，关键性改革的缺失却意味着，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他们依然是挣扎着生存——对于数以百万计在赤贫中挣扎的农民来讲是如此，对于缺少廉价住房、栖身贫民窟的人们来讲也是如此，对于因为公立学校办得一团糟，而不得不倾其所有，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的家庭来说，还是如此。

我们之所以还得挣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推行并落实关键性的观念。有一个时期，我曾在德里的一个协商委员会和邦一级的咨询机构中担任过相关职务，所以有机会同我们的部长们进行坦诚的交谈。应当承认，印度政客尽管有着种种缺点，却不得不在我们的政府中进行复杂的权衡。在政府里，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占据上风。在这种制度下做民意代表就意味着，要同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就资金问题讨价还价，从往往是不情愿的官僚群体那里挖掘项目，在各式各样互不搭界的邦一级的机构中间推行某项日程。自然，他们还要满足自己选民的种种要求，多少保持自己的影响力，熬过充满变数的选举周期。这些各式各样的影响和压力意味着，遇到政策问题的时候，总是紧迫的问题要优先于重要的问题，策略上的成功要优先于战略，获取资助要优先于大众福祉。结果就是，这些人中间产生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一位著名政客同我的谈话中表现得很明显。当我缠着他要就某些政策理念谈谈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同你谈没多大意思——在钞票问题和选票问题上，你都没有用处。”

在这类谈话过程中，我一直觉得同印度新的乐观主义，以及它那欣欣向荣的市场相距甚远。当人们关注的问题和兴奋点如此迥异的时候，政府、企业家、中产阶级和穷人之间找到共同点并不容易。事实上，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近年来我们对印度经济的观念分化得更严重了。

另一种观点

我有幸得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目睹了这些分歧。当然，对印度政治来说，我是局外人。但若谈到印度商界，我就有发言权了。作为印孚瑟斯的创始人之一，我在这儿工作了26年，可以自称为印度企业家了。然而作为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印孚瑟斯面临的挑战与印度其他产业部门不同。当年，基础设施的匮乏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国际市场。我们的业务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根光缆和几台电脑而已。困扰印度传统工业的劳工问题和罢工，我们很少遇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政府不承认我们是“常规”产业，因此，其规章制度也没有对我们形成障碍，那些曾使制造业和农业部门窒息的种种管制也不会影响我们。我们不需要原材料，比如铁矿石和煤炭，而这种需求迫使印度公司不得不同控制这些资源的国有公司打交道。我们也不需要同官僚们拉关系，定期到德里去拜访。因此我们没有被拖入其他印度公司陷入的窘境。这些公司既受益于，又受制于同政府建立起来的关系。

在文化上，我们也是独具一格的。当年，我们是7个瘦削的工程师（唉，现在可都不瘦了），属于未经历练的第一代企业家。在印度工业由家庭企业主导的时代里，我们属于异类。在这种印度公司里，经营权和财务权都为公司所有者所独断。尽管面临权力带来的种种邪恶的诱惑，有些公司依然坚挺，但还是有不少公司在经营上任意胡为，很难为小股东带来利润。公司的运作经常是不透明的，带有欺骗性——例如，在采购原材料或者进口资本货物的时候，公司常常虚报价格，同时又瞒报销售量。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常说一个笑话就是，这些公司的所有者的赢利都是“RBI”^①式的。行业观察家们总是讥讽说：“公司会破产，但是所有者却不会。”

印孚瑟斯是最早以透明和强化内部管理的风格改变了人们对印度企业的这一看法的公司之一。我们很快就建立起了为广大股东创造财富的声望。人们开始把我们称为印度的“新经济”公司。15年后，人们还是这样称呼我们。

^① “RBI”，英文returns before investment的首字母缩写形式，即“还没投资就赢利了”。——译者注

印孚瑟斯从一开始就与印度工业的典型历史、家族关系以及管理上的包袱无缘。因此，与其说我是印度工业经历的种种磨难的亲历者，不如说我是观察者。我完全有希望从这种贴近性和客观性的结合中获取一种少有的、宝贵的视角。尽管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私营部门度过的，但是我却有幸短期参与制定过邦一级以及国家一级公共政策，从而直接体会到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始以来政府面临的各种挑战。

尽管关于印度，我私下已经了解到许多有趣的讨论和观点，但是撰写一部有关这个国家的书需要作出的跨越却是另一个层次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作家，心中也不曾蕴藏过记录下什么以求有一天终能成书的欲望。然而，促使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在2006年年初遇见了维贾伊·科尔卡。科尔卡博士是印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一位激情洋溢的改革家。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他的崇拜者，尤其是在拜读了他2002年发表的名为《印度：在增长的大路上》的大作之后。文中预见了一——后来其预见被证明异乎寻常地准确——印度此后几年的增长趋势。科尔卡博士看起来很像一位严肃的学者，但却有着奇特的幽默感和直言不讳的名声。这一点有时在他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会给他惹麻烦。“可是我发现，”他告诉我，“只要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不管当时民意代表们会多么反感，都还是有作用的。这样会在人们中间播下新观念的种子。有时，这些观念会为大家所理解。我觉得这种传统做法是最靠得住的，值得一试。”

科尔卡博士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或许，我会写出一本有价值的著作——假如我能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所熟识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政客们的经验提升为某些观念的话，这些观念不仅可以解释印度经济会成长为一只什么样的巨兽，也有助于为这个国家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即使这意味着要引发争议）。

作为企业家和公民，我深为印度过去25年间的经济发展所鼓舞。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年增长率高于6%，历史上曾超越它的只有中国。在其他领域，我们也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进步，国内市场兴起，人均收入提高，还形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但是印度的成功是苦乐参半的。在实行改革20多年以后，印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引发了我和许多同胞心中的各种情感——对我们迟迟不能

进行变革，我感到迷惘和失望；对在整个印度都显而易见的平等顽症，我感到悲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印度的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让人愤怒，使人无法利用印度今天所拥有的巨大机遇。

我走南闯北的经历让我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印度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在世界各地，在人们的心目中，印度有着独一无二的前景。年轻化的人口和企业家队伍、日益提高的信息技术水平、会讲英语的劳动力大军，以及作为民主国家的实力，种种因素都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它似乎在跃跃欲试，要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但是，我更多的是在异国他乡才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人们对于印度的乐观态度——让他们形成这类看法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数据。这些看法远离我们国内政治辩论的喧嚣，从未被其触动。而在国内，印度的机遇在人们看来就有些脆弱了。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许多因素正在使我们退缩不前——其中有对我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的悲观，也有对我们为解决现存问题需要推行的种种观念的抵制。

印度的弱点全部存在于其内部，存在于眼下的争斗中，争斗的目的在于确定我们国家未来的观念和政策走向。这本书就是本人对这场争斗、解决这场争斗而作的一次小小的尝试。

在主业之外

当我对人说起自己要写书的时候，大家误以为，我要写的是有关自己经商生涯的一本回忆录，要么就是一本管理或者商业战略方面的著作。当我说自己写的是关于印度的书的时候，大家便露出嘲弄（很可能也是吃惊）的神情。毕竟，商人通常不会在公共事务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智。我安慰自己说，我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成为企业家的。如果不是在1978年年底走进颇具个人魅力的纳拉亚纳·穆尔蒂的办公室求职，那么很可能到现在，我自己充其量也不过是住在新泽西的郊区，每天要坐火车去曼哈顿，默默无闻地做着一份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而已。

我看待问题的方式，以及无论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还是在政治学领

域，我都并非某一类型的专家这一点，实际上会使我对印度最重大问题所持的看法更为开放。正当人们的观点趋于两极分化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一位热情高涨的非专业人士，一位可以在辩论中避免走极端的人士登场。

尽管本书内容是关于印度的，但却不是为痴迷于印度电影和板球的人们撰写的——尽管这两个话题都能引人入胜，但是我在这两个话题上不能多费笔墨。相反，我希望通过印度这个国家观念上的演变过程来理解这个国家。我认为，每个国家，不管情况如何复杂，都会受某些中心议题或观念的制约——最终将所有国民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共有的核心观念。比如，法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美国天赋机遇的观念，以及新加坡对“和谐”的重视，都成为形成上述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决定性观念。

对国情复杂的印度尤其如此。它既是一个民族，也代表一种观念。经历过殖民主义时代意味着，印度的现状不是沿着自然轨迹演化而成的。各个分散的地区，是按照有益的观念或无益的观念，按照英国行政官员的观念或者印度领导人的观念凝聚到一起的。我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这种观念的力量是在5岁的时候。自然，我是后来才明白这些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大家都塞进了他的车里。那是1960年，班加罗尔正在举行国大党大会，我们到那里去就是为了看一眼颇具领袖魅力的尼赫鲁。作为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卓越领袖，作为国家第一任总理，他的地位在印度国内外无可比拟——对整整一代人来说，他就是印度的代名词。在我的记忆中，站在路边，被夹在人潮中间，朝着这个瘦削、热情洋溢、气质高贵的人挥手的情景尤其令人难以忘怀。

生长在那个年代的人极易信奉政府包揽一切和公有制的观念。公司为一个家长式的社会主义政府所有；财富由它们创造，然后用于社会的福祉。为什么要让财富掌握在私人手里，使其可能被用于邪恶的目的呢？这在当时听起来很有道理。这种观念出自慈祥的大家长尼赫鲁之口，其逻辑似乎无懈可击。我父亲，一位热情的尼赫鲁的追随者，总是大谈大企业的种种罪恶，以及印度模式是多么理想的模式。当年很多印度人信奉这样的观念。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因此，本书的结构基础是印度各种观念的消长，以及这种消长对印度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影响。比方说，早年印度刚获得独立时，很多人将英语视为一种帝

国主义者的语言并竭尽全力将其边缘化。这包括试图把印地语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在邦立学校里限制，甚至严禁英语教学。但是，一旦外包业务使英语成为进入全球经济和高收入行业的入场券，掌握这种语言很快就成为人们的一种向往，成为向上爬的阶梯了——不仅对中产阶级，而且对印度的穷人来说，也是如此。结果，目前全国各邦的政府正纷纷改变传统的排斥英语的政策，甚至连那些印地语民族主义情结最强烈的地区也概莫能外。这就是观念改变的力量。

根据人们对种种观念所持的立场，我将本书分成了四部分。第一部分谈的是这些年来人们的态度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急剧变化。我认为，正是这种种变化带来了印度当今的勃勃生机。比方说，印度众多的人口曾一度被当做经济增长的累赘，而现在却被视为潜在的“人力资本”，一笔巨大的资产。我们不仅前所未有地普遍接受了印度的企业家，而且同以前相比，对于全球化也持更为乐观的态度。在改革后的年代里，我们目睹了很多针对在印度经营的跨国公司的抗议活动。可口可乐公司竖起了广告牌，宣布：“我们回来了！”我们的活跃分子则在广告牌上写上：“等着我们把你们再赶出去吧！”肯德基得面对当地巡视员的不间断造访，他们怀疑肯德基所用的鸡肉有问题。印度教的活跃分子在孟买的麦当劳快餐店前举行过抗议活动，要求麦当劳“离开印度”，这让人想起了印度独立前那个时代的口号。然而现在，新的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却无人再说三道四了——印度人同时对本国公司在国外的收购活动感到格外自豪。

本书第二部分探讨的是现在依然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对于某些观念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但却依然未见将其落实的效果。比方说，在过去的20年间，完全扫除文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可是，目前就普及教育、消除对学校状况的不满情绪来讲，我们依然处在制定战略的阶段。

同样，我们长期以来就认为印度是“生活在村庄中”的国家。早年的印度政府居然宣称，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一种不好的趋势，必须被控制，甚至逆转。而现在，在经历了几十年对城市化的敌视以后，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要想让国家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众多城市的出现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必要的。我们也开始接受这一点，即必须改造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并且行动要快。印度终于开始抛弃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章程，限制了邦与邦之

间的贸易——现在人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印度的法律不应再因循守旧，而必须以建立共同的国内市场为目的。

第三部分探讨了印度国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党派分歧最为突出，难以达成一致这一点已经严重阻碍了制定急需的政策。比如说，眼下人们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在进行激烈的辩论——高校该如何管理，以及邦政府对私立大学该发挥什么作用。人们就劳工问题的争论也是十分激烈。甚至在因为印度各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对工人的需求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关于是否需要放松劳动管制这一点，政府依然深陷于严重的意见对立之中。人们就这些问题的争论火药味十足——存在分歧的是把改革视为对人民的经济授权和把改革视为对人民的经济排斥的这两派人。

书的最后一部分论及印度国家政策中被遗忘的角落，其中谈到的观念尽管对人们的前途来说至关重要，但在公共话题中却多半不会出现。最后的这部分内容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我们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得心应手了。在18世纪以前，印度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巅峰时期，印度和中国两国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各种观念帮助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法律、哲学和科学。然而，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却总愿意效仿在发展中比它领先一步的那些国家。印度现有的许多体系都是舶来品——来自英国的议会制度和立宪模式，还有早期来自欧洲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印度的各项改革，尽管进行得很大胆，但效仿的样板却是先前在世界各地业已被证明是成功了。印度公司遵照的也是全球的最佳惯例和最优标准。

但是，在观念的创新方面，印度经济的迅速增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高得多，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现有的像医疗、能源和环境这类问题的解决方式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了。比方说，印度的能源政策不能建立在大量消耗碳氢化合物的基础上。印度现在就得具有环境方面的忧患意识，而不能像某些发达国家那样，等到工业化进程损害了自然资源后才着手拯救环境。印度还得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讲实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保证在公众健康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不至于像发达国家经历的那样，从健康维度的一端，饥饿，摆向另一端，营养过剩。最后，印度还必须将现代科技发明更充分地融入未来的发展。